

# 李泽厚： 把哲学归还给生活，归还给常人（二）



49岁的李泽厚（1979年于北京十渡）

李：还是命运。它能成为今天的哲学“概念”吗？恐怕不可能。但我仍然认为，命运，也就是人（人类和个体）的“立命”问题，应是哲学的核心。

例如，今天人类面临着—一个可以毁灭自己整个族类的时代。这就关切到人类的命运。过去，无论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都没有过，这是现代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为什么西方反科技的声音那么强，包括海德格尔要那么大声疾呼反对科技？就因为现代科技的确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对核战争的担心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哲学应该予以考虑，这也是一种“究天人之际”。

马：您讲“命运”的主题是“人性、情感、偶然”，它们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在现代。

李：非常重要。比如，到底什么是人性，或人性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谈论了几千年而至今并无定论的大问题。我的哲学主题是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答“人性”（包括心灵）是什么，这也就

是“双本体”（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塑建问题。几十年讲来讲去无非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这倒似乎是前人在哲学上没有做过的，而且还有现实意义，因为随“告别革命”之后的便是“建设中国”。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如何建设？对世界、对人类将有何影响？兹事体大，谈何容易。前景茫茫，命运难卜；路途漫长，任重道远。

再如，偶然问题。后现代哲学把它讲得很充分，我就不展开了，只简单说几句。《批判哲学的批判》和几个主体性提纲，就是强调偶然以对抗当时盛赞的必然性、决定性。在自然领域，有人胡说量子也有“自由意志”，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偶然”，量子力学不是机械力学和传统决定论所能解释的。但偶然又不是毫无因果、毫无秩序可寻。量子力学也有概率性的规则在。审美和艺术是自由性、偶然性最大的领域，我曾以DNA来比拟其多样、复杂和变异，但也仍然有秩序可寻。我在《认识论答问》（2008、2010）中又强调了秩序和秩序感的重要。我说“天地有生之德”的“生生不已”

正是靠秩序而维持，“日月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这“行”这“生”这“法”这“美”便是秩序，却又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所以才有“以美储善”“以美启真”。“情本体”哲学指向的是这个神秘的宇宙存在及其秩序和偶然性。所以认识论不只是逻辑学，也不只是心理学。

历史更充满偶然。从人类看，所谓“必然”也只是从千百年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如工具的改进、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但对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却没有这种必然；相反，无不充满着偶然。人类的命运由人自己去决定、去选择、去成就。每个人都在参与创造总体的历史，影响总体的历史。从个体看更是如此。个体的命运愈益由自己而不是外在的权威、环境、条件、力量、意识所决定，从而偶然性愈益突出。在时间上，人将愈益占有更多的纯粹由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不再终日停留和消耗在某种服务社会的机器里，这便可以愈益自由地选择、把握、支配、决定自己的行动和生活。在空间上，作为世界人，活动的空间急剧扩大，人际接触和交流愈益频繁多样，生活状态愈益多元丰富，不可控制、不可预计的成分也愈益增多，这也使偶然性急剧增大和变得非常重要。从而，人对自己的现实和未来的焦虑、关心、无把握感也愈益增大，

也即命运感加重。求签卜卦的人会更多，人也会愈益深刻地感到自己被偶然地扔掷在这个世界中，孤独、荒谬、无可依靠、无所归宿，于是只有自己去寻找、去确定、去构建自己的命运。人生即在此偶然性的旅途中，自己去制造戏剧高潮。

## 可以是提纲，不必是巨著

马：从早年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到后来的《批判》，可以看出您倾向于建立一个体系，但至今都没有撰写一部涵盖您思想各个方面的体系性的论著。

李：这要看你所谓的“体系”是什么意思。早年受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的影响，我对建立体系有兴趣。后来我反对故意构造体系。我不以为非要去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新理论，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体系总是试图给人一套规范的东西，这套东西经常管制着人家，成为所谓知识-权力结构。

从内容讲，用过于清晰的推论语言和知性思辨的体系著作便无法真正把握哲学的精神，正如用理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已为康德所驳难）、用理论来解说诗一样，既不可能，也没意义。它们只成为解构的对象。从形式说，我不大喜欢德国那种沉重的做法，写了三大卷，还只是“导论”。我更欣赏《老子》五千言和那些禅宗公案，《论语》篇幅也远小于《圣经》，但它们的意味、价

值、作用并不低，反而可以玩味无穷。你能说它们没有“体系”吗？没有巨著就不是哲学吗？所以，从这两方面讲，我都认为哲学可以是提纲，不必是巨著。

马：但您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尽管由不同论著重新组装而成，却融会贯通，自成一统，难道不是一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吗？有学者还将您的哲学分为“纯粹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美学哲学”六大块。

李：这本提纲性的书只是我的视角。当然，你硬要说它是所谓“体系”，也无不可。

马：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您晚年的哲学论述大多采用通俗问答体。

李：是也。这可能让许多学人颇不以为然。哲学本是从对话、问答开始的，老祖宗孔子、孟和西方的柏拉图不都如此吗？《朱子语类》不就比《朱文公文集》更重要，影响也大得多吗？“通俗化”不是肤浅，它要求把哲学归还给生活，归还给常人。通俗问答体有好处，彼此交流思想，生动活泼，鲜明直接，却无妨深刻尖锐，不会成为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也不会使人昏昏欲睡。真正重要的东西，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不必那么烦琐。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